

第一部分

自由史

一、古代自由史

自由从 2460 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直到在我们民族成熟收获。它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精美成果；自从那些懂得此术语含义的民族决心获得自由以来，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每一时代的进步都被自然灾害，被无知和迷信，被征服欲和安逸，被强者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欲求所困扰。当人民从野蛮状态、外来控制和长期的生存斗争之中苏醒时它已经阙如已久，当时对政治失去了任何兴趣和理解力的人渴望为了一口燕麦粥出卖自己的生存权，而无视他们所弃之物之珍贵。在任何时代自由的忠诚之友都非常稀少，它的胜利归功于少数人，他们成功地联合了那些意见经常不同于自己的人作为援助；这种联盟总是危险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它给反对者以反对的口实，在胜利时也会引发对胜利成果的争端。对自由性质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以致从来没有什么障碍是如此持久和难以克服。即使敌对势力造成了那么多伤害，错误观念所造成的还更多；但知识的扩展和

* 本文与《基督教自由史》首次作为阿克顿勋爵于 1877 年 2 月 26 日和 5 月 28 日在农艺大厅对布里奇诺思学院成员所作的两个演讲《古代自由史与基督教自由史》发表（布里奇诺思 C 爱迪金印刷厂），两项讲演分别为 11 页、12 页。第 2 次发表于《自由史》第 1—60 页；《自由与权力》，第 30—87 页；《历史自由的解释》，第 243—299 页。

法律的改善仍显示了它的进步。制度史常常也是一部蒙昧和幻觉的历史；因为其作用有赖于其所产生的观念以及将之保存下来的精神，在内容实质出现变化时形式仍可保持不变。

现代政治中有少数几个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何我论证的重点在法律领域之外。常有人说我们的宪法在 1679 年通过《人身保护法》时形式上已很完美。然而查理二世继位仅 2 年，就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之外。1789 年，在凡尔赛召集三级会议之时，比自由大宪章更悠久、比我们的下院更有威望的西班牙议会在间隔几代人之后也告召开，但他们立刻请求国王不要与他们商量，以他自己的智慧对权力进行改革。公众舆论认为，间接选举是对保守主义的一种保护。但是法国革命的所有参与者都来自间接选举。有限制的选举被公认为是君主制的另一个屏障。但是由 99 万名选举者选出的查理十世的议会反抗并推翻了这位君主 而由 25 万选民选出的路易·菲利普的议会顺从地推进他的大臣的反动政策，在关键的表决中拒绝改革，对这位君主卑躬屈膝 基佐也得到 129 位官员的大多数投票支持。没有报酬的议会显然比大多数接受报酬的欧洲议会更加独立。但是美国派一个人自费从此地到君士坦丁堡这个费用最昂贵的首都生活一年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总统在法律上和对外似乎是华盛顿的继承者，其权力是费城制宪会议设计的且受其制约。实际上新总统并非如这位共和国之父所想像拥有不同于民主制的君主般广泛权力 因为那会让 7 万人的公职发生变化 50 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仅解雇 2 个人。购买官职很明显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古老的法国君主制的这种可怕实践产生了能与国王相抗衡的惟一法人团体。会毁掉一个国家的官吏腐败在俄国被当做有益于减缓绝对主义压力的因素。在此情况下说奴隶制本身是自由道路的一个阶段简直是一种夸张。因此我们今晚不必像关

心人们的活的思想那样细究法规、法令死的字面含义。众所周知，一个世纪以前大法庭一个法官听讼，当事人必须付三个人的钱，但是没人注意到这种暴行，直到一位年轻的律师对过去的事情及与此相关的制度的方方面面产生疑问并带此怀疑进行严格的检查。那天一线曙光照亮杰里姆·边沁清澈而坚定的心，在政治日历中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胜过很多政治家的整个任期。我们很容易指出圣奥古斯丁某段话或格劳修斯的一个句子对 50 人议会法案的重大影响，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塞罗与塞尼卡、文纳与托克维尔的要多于莱库古立法或法兰西第五法典。

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斗争。在古代，国家所掌握的权力不仅来自自身，而且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中世纪它的权力很小，而遭受了其他入侵。现代国家常落入这两个极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按此定义，自由是宗教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因此我所论述的主题是在选民 [基督教] 的历史中得到第一次闪光。希伯来人的政府是一个联盟，其形成不是靠政治权力而是靠种族和信仰的一致，其建立不是立基于物质的力量而是自愿的契约。自治的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个部落，而且至少在 120 个家族的任何一个都得到实行：在法面前既没有特权阶层也没有不平等。君主制与这种共同体的原初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撒母耳以对所有亚洲王国和许多欧洲王国所一直坚持的东西作强烈抗议和警告来抵抗。该王位的建立依据一项协议：国王被剥夺了对人民的立法权，他们承

认的立法者只有上帝，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是恢复法的原初纯净，让政府符合上苍认可的神圣的理想范型。那些在反对篡位者和暴君的无尽预言中苏醒并受到鼓舞的人们经常宣称神圣的法无比高于罪恶的统治者，并从已建立的权威，从国王、祭司和王公贵族转向呼吁回复潜藏在群众中未堕落意识之力量。因此希伯来民族的榜样阐明两条平行的路线——民族传统教义和更高律法的教义：法律的成长有其根源与发展过程，但其实质不会改变的原理以及所有政治权力都必须根据一种非人为的法律进行检验和改革的原理，循此能够赢得所有的自由。这些原理的运作，无论与之一致与否，都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空间。

在神权之下的自由与人类专制主义权力之冲突，结果是灾难性的。公元前 622 年耶路撒冷作最大努力以改进和保存该国。耶和华神殿的大祭司拿出那本已被遗弃和遗忘的律法书，国王和人民都曾发誓遵守和受束于它。但是这个有限君主制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早期例子既没有延续也没有扩展：自由取得的力量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求。在公元前 586 年君主专制的洪水淹没了这个曾经存在而且注定会再次存在的城市，它是东方的自由圣殿，西方则将为其准备一个新的家园，那里有大海、高山和坚定的心灵为其护卫，圣洁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都将生活在它的身影下，它伸出自己无敌于天下的臂膀，动作缓慢然而坚定地指向整个文明世界。

按照欧洲大陆那个最著名女作家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却是新的。为该普遍真理辩护是新近历史学家的骄傲。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证明了这一点，条顿人的欧洲则是更为充分的证明。无论我们在哪里追溯雅利安人的早期生活都能发现有利于发展成自由社会的条件和辛勤劳作的文化。他们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兴趣，对外在的权威没

多少敬意，对国家的作用与至高地位有一种不完美感。在所有权和劳动分化不充分的地方阶级和权力也没多少分化。他们可以逃脱专制主义，因为未被多种宗教所纷扰的社会能避免迫害，直到社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文明问题的考验。总的说来，父权制时代在随着生活发展出现难题和诱惑时该形式不能抵抗专制国家的生长；有一个主权国家是例外，它不在我今天的论述范围内，以以后时代的直觉追溯其何以幸存几乎不可能。耶稣诞生 600 年前专制主义束缚被摆脱。在整个东方它受到祭司和军队的始终如一的支持。在西方，没有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解释者的圣书 祭司不需要太多 伴随贵族阶级的诞生国王的权力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是数代之久的阶级对阶级的残酷统治，富人对穷人以及知识阶级对没有文化者的压迫。其支配性精神可以在贵族西奥格尼斯充满激情的诗句中发现，他是一位天才和优雅的人，公然声称渴望饮他的政治对手的血。许多城市的人民都希望僭主能减少不可容忍的暴政，以寻求从这些压迫者那里得到解救。这种补救给犯罪以新的形式和动力。暴君常常是具有惊人能力和长处的人 如 14 世纪意大利城市中自立为君者中的一些；但是由平等的法律和权力分享所保障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一个最具天赋的民族把世界从这种普遍堕落中解救出来。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级所烦扰，为避免暴力任命梭伦修改法律。这是历史记载中最令人愉快的选择。梭伦不仅是雅典已发现的最聪明的人 而且是古代最有远见的政治天才 他通过温和、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拯救了他的国家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我们的时代也以寻求建立这样一种权力而自豪。这场变革除了启示宗教外为社会的复兴做了一切。上层阶级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之权 他让他们把对所有权的关注仅仅转向财富 那

生来就使人具有特权的東西。对于那些单独拥有能够支撑公共税务和战争重负财力的富人，梭伦根据其财富需要让其分享一定比例的权力。最贫穷的等级被免除直接的税务，但也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梭伦让他们从他们之上的等级中选立法官为他们说话，而这些官员有向他们报告之义务。这个显然很微小的让步是巨大变化的开端。它产生了这个思想，一个人应当有权挑选那些正直和智慧之人，他的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生命必须托付给他。这个观念完全改变了人类的权威概念，因为它是道德影响王国的开始，在那里所有政治权力都得依赖道德的力量。依靠同意的政府取代了依靠压制的政府，站立在塔尖上的金字塔终于矗立在其基础之上。通过充当每个公民自己利益的保护人，梭伦让民主的因素进入国家。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光荣是创造一个公众的政府。他相信没有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而提出对所有行使权力者的行为实行有警觉的控制。

众所周知，直到那时反对政治骚乱的惟一对策是权力的集中。梭伦通过分权达到同样的结果。他给平民以很多他们认为能够运用的影响，从而可以使国家免于武断的统治。他说，民主的要义是不服从任何主人而只服从法律。梭伦认识到政治形式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违背的，它们必须适应事实，为修改他的宪法而不破坏连续性或失去稳定性他又贡献很多，以致在他去世几个世纪以后安提卡的演说家仍称赞他这方面的功绩，雅典法律的全部结构都引用了他的名字。雅典法制的生长方向已由梭伦的基本教义确定，即政治权力应当始终服务于公众。波斯战争期间为民主制出力使为贵族命令效劳黯然失色，因为在爱琴海战胜亚洲人的海军舰队由较穷的雅典人指挥。勇敢地拯救这个国家和保存了欧洲文明的那个阶级获得了增进其影响和特权的资格。国家政务曾经为富人所独占，现在被推翻而对穷人开

放，为确保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部分，最高权力由全体人民分享。

在古代权威崩溃之时，没有公认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权利为迅速变化中的社会制定构架。政体的不稳威胁统治原则。民族的信念开始受到怀疑，然而怀疑并未让位于理智。有一段时间公共职责及私人生活认同于众神的意志。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帕拉斯 雅典的智慧女神 以及发布来自两个最高诗坛之间的神殿之神喻的太阳神为希腊民族贡献良多，旨在保持宗教的崇高理想；但是当经过启蒙的希腊人学会把他们敏锐的理智能力用于他们所承继的信念系统时，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神的概念败坏生活并使公众的心灵退化。公众的道德不能靠公众宗教来维持。不再依靠神的道德命令，也不可能从书本中找到没有令人敬畏的、由专家来阐述的法律 没有具有神圣名望的人所讲解的教义——没有类似于遥远的东方的国师式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话仍然统治着近乎一半人类的命运。随这些衰败而开始的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推理说明事物之努力。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雅典画廊派和学院派的哲学家把口述的智慧和德行转变成一个持久和意义深远的体系，它大大减轻了后来基督教的任务。但是那个时代还没到来。

那怀疑和转型的时代是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人从暧昧的神话走向明亮的科学之光，竭力用某种真理代替能力有限的权威的描述 古希腊知识界的精力也开始被之吸引 这是人类世俗历史中最伟大的运动，即使在基督教完成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以后我们的哲学乃至我们所拥有的政治知识中那些较优秀部分许多也归功于它。伯里克利是雅典政府的领袖，也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迅速衰落对政治领域形成压力。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领域 没有权威是不可撼动的 这种观念呼

之欲出。没有能够被完全信任的领导；对于控制或拒绝人类常有罪行之手段，也没有可资利用的标准。公众倾向于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是错的，但是没有检验的办法。从实际目的的角度看人民是善恶知识的基础。因此，人民是权力的基础。

伯里克利的政治哲学包含了这个结论。那些支持财富之人为的支配地位的人，受到他坚决的打击。对于古代权力与土地相联系的观点 他提出权力应当平等普及的思想 就像对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安全一样。他对专制君主宣布，社会的一部分人应当统治全体，或者一个阶级应当为另一个制定法律。这种特权的雄心只不过用于把君主专制改为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如果伯里克利不把公民权限于纯粹雅典血统作为平衡之补偿的话。通过此标准剥夺了 1.4 万人的公民权，他们形成了我们应称之为第三等级的阶级，其人数约与更高的两个等级相等。伯里克利认为每个忽视参与公共事务的雅典人都应该受到全体公民的惩罚。没有人因财产而被排除在外 他让参加的穷人得到报酬 报酬来自国家基金；因为他支配的联邦贡赋聚集的财富超过 200 万英镑。他取得优势的手段是说话的艺术。他的统治靠劝服。一切决定都经过公开细致的辩论，一切影响都服从思想的优势。宪法的宗旨不是确立任何利益的支配地位而是防止它；给劳动者的独立地位和财产安全以同样的关心；保护富人的安全反对嫉妒 以及保护穷人反对压迫 这些思想标志着古希腊政治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几乎使那位构想它的伟大爱国者为之献出生命 充斥整个历史的是通过利用金钱、土地或数量优势打破权力平衡的努力。随之而来的一代人在诗歌和修辞方面的著作从未达到上一代人同样才能 其历史、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仍然不可超越。但伯里克利却没有继承者，没有人能够胜任从他手里传下的权杖。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原则为雅典宪法所采用，这是民族进步的重要一步。但是对那些在投票中失败的人说来就没有补偿。法律不能制止多数的胜利或将少数从数量上被超出的可怕惩罚中拯救出来。伯里克利的压倒性影响消失时，阶级之间的争斗无限制地流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杀戮降临较高的等级，较低等级不可避免地占据优势。雅典人永不安分和探索的精神促使其把握每一制度的理由和每一原则的结果，他们的宪法以空前的速度跑完从幼年到老年的过程。

从梭伦第一次承认平民的影响到该国的衰落间隔两代人时间。他们的历史提供了在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下民主制风险的古典范例。因为雅典人不仅勇敢、爱国和富有牺牲精神，而且他们是最有宗教意识的希腊人。他们尊重给他们带来繁荣、平等和自由的宪法，从来未对规定公民大会巨大权力的这个根本法律产生疑问。他们相当容忍各种舆论和声音；他们对待自己奴隶之仁慈曾使最开明的贵族也感到愤怒。因此他们成为靠民主制度繁荣的惟一古代民族。但是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腐蚀良心、麻木心灵，使君主丧失理智力，也败坏了灿烂的雅典民主制。少数压迫多数是不好的，但多数压迫少数更糟。因为它把潜在的权力留给群众，如果它运作起来，少数人很难抵抗。但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没有上诉，没有补救，除了背叛以外没有避难所。雅典最低微、人数最多的阶级与立法权和司法权联系起来，还部分拥有执行权。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也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法高于国家法律——立法者则在法律之上。

随之而来的是拥有统治权的人民有权利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除了对自己有利的判断不受任何是非界限的约束。在一次纪念盛会上雅典人宣布如果他们不能做他们选择的任何事将是很可怕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他们；他们决定不受

任何责任的限制 也没有什么法律能够约束他们 除了他们自己制定的。以此方式解放了的雅典人民成为暴君 他们的政府 欧洲自由的开拓者，受到古代所有最有才智者一致强烈谴责。他们试图以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方式来指挥战争，结果他们毁了自己的城邦。像法兰西共和国一样，他们把他们打了败仗的指挥官处以死刑。他们以这样不公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附属国，以致他们失去了海上帝国。他们掠夺富人直到富人密谋与公开的敌人勾结，他们也因苏格拉底的殉难而被戴上罪名。

大多数的专制统治持续了约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掩饰，而国家衰落了，厌倦和绝望的雅典人终于承认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认识到为了自由、正义和法律平等有必要对民主制本身作些限制，正如对寡头政治已经做的那样。他们决定再次采取古代的方式，恢复统治权力被从富人那里拿来穷人却还没得到时曾有过的物物秩序。第一次恢复失败了，它仅因修昔底德而被人记起 修氏的政治判断从未出错 他宣布它是雅典人曾有过的最好政府，该尝试由于具有更充分的经验和更加伟大独特的目的而获得新生。敌对的政党实现和解 并宣布大赦 这是历史的第一遭。他们决定靠赞成来统治。受到传统支持的法律被简化为一种法典：最高会议有不同意见时任何行动都是不合法的。在仍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与满足世代需要和现时观念的法令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付出很多代人心血的法律之构架独立于短暂违反的公众意志之外。雅典人的悔改来得太迟了，已救不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记取，因为它告诉我们全体人民的统治与最大多数和最强有力阶级的统治如同纯粹的君主专制是同样性质的罪恶，基于同样理由需要有防范它的制度，以及应该实行法律的永久统治以反对舆论的革命专制。

与雅典自由的兴衰相平行，罗马也忙于解决同样的问题，它有更强的创造力，也有更为短暂的成功，但最终的结局却远为悲惨。在灵巧聪颖的雅典人把辩论发展为雄辩术的地方，罗马却展开对立力量的斗争。理论政治学并不能吸引罗马人生硬而讲究的天赋。他们并不认为最聪明的方式是解一个难题，而只不过表明有了类似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遵循先例而不是左右当时的发展和精神。他们独特的品性促使他们把自己法律的起源归于先代，为想证明他们制度的连续性以及摆脱革新的主张，他们设想了罗马国王的传奇历史。他们固执于传统之劲头使他们的进步缓慢，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前行一步，同样问题一再出现。共和国的制度史从贵族与平民的较量开始，贵族声称是仅有的真正罗马人，他们想保持从国王手中得到的权力，而平民也想从中分享一份。这种在热切而永不安宁的雅典人那里只进行了一代人的争斗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开始平民被排除在城邦统治之外，他们纳税沉重，承担公务却没有报酬，直到公元前 285 年，他们才被承认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接下来是 150 年空前的繁荣和昌盛；最初的争端已达成妥协，如果不是从理论上已加以解决的话，但后来却从中产生了新的斗争，它没有结果。

由于无休止的战争服役而恶化的众多贫困家庭沦落到依附约两千富人构成的贵族的地步，这些贵族分享这个国家的巨大疆域。当这种需要变得强烈时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把富人阶级在国家土地中的份额分一些给平民来缓解它。那些出生高贵的古老而著名的贵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知道妥协的艺术。后来更为自私的贵族却不能够学会这一点。人的品性为更为严酷的争斗动机所改变。政治权力之争有所节制是英国政党斗争的一个可贵品质。但是以获取物质资料为目标的斗争进行得很严酷，如法国的国内纷争那样激烈。在一场 22 年的斗争之后由

富人所推动,32万依赖官方食品供应的人愿意跟随任何允诺他们用革命得到凭借法律不能得到之物的人。

有一段时间代表古代将要消亡事物秩序的元老院强大得足以压倒每一位新产生的公众领袖,直到朱利厄斯·恺撒出现,他受一支军队的支持,这支军队为他在无与伦比的征服生涯中所领导。同时他还受到饥肠辘辘的农民的支持,他靠慷慨的赏赐赢得这些农民。他的统治艺术也高于其他任何人。他通过一系列既非暴力也非不公的手段把共和国改变成君主制。

帝国保存共和国的形式到戴克里先统治之时;但是这位皇帝的意志不受控制,就像保民官胜利后人民之所为。他们的权力是专制独断的,即使在其被广泛分享之时。然而罗马帝国对自由事业的贡献要大于罗马共和国。我这样说的理由并非指那些短暂偶发的事件,如有一些皇帝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众多机会,如涅尔瓦,塔西陀说他把君主制与自由等在其他情况下无法共处的事情结合到一起。或如其赞颂者所宣称,该帝国是完美的民主制。事实上它至多是伪装拙劣和令人憎恨的独裁专制。但是腓烈特大帝是位专制君主;他却有宽容精神和允许自由讨论。波拿巴家族是位专制君主,但在他1805年摧毁共和国之后没有任何自由派领导者如拿破仑一世那样受到大众的欢迎,拿破仑三世则在1859年达到他权力的高峰。同样,罗马帝国在对人类的深切关心上要领先相邻地区的宫殿不少,特别在时间上。穷人得到了他们在共和国徒劳向往的东西。富人生活得比三头执政时更好。罗马公民权扩大到行省的人民。罗马文学中较好的部分和几乎全部民法都属于帝国时代,正是帝国减轻奴役、规定宗教宽容而成为法治民族的开端,并产生了一个完美的财产法体系。被恺撒颠覆的共和制,只能算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令人羡慕地提供公民权保护,却粗暴地对待人权,而让罗马人对其

子女、债务人、奴仆，罪犯与奴隶肆意妄为。这些更深刻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没有体现在市政法的文告上，没有对之作出任何解释，而且思考这些问题的哲学也被屡屡视为叛乱与不忠。可是对于这些思想，希腊人熟烂于心。

最后，155 年雅典哲学家卡尼德出现在罗马，肩负一政治使命。在公务之余他作了两次公开演讲，让他的国家那些不谙文字的征服者领略一下兴盛于雅典学派的辩论之风。第一天他讲的是自然正义。第二天他否认其存在，认为我们的所有善恶概念都来自实在法。从那次难忘的炫耀之后，这位被征服的天才就使其征服者着迷。罗马最杰出的公众人物，如西庇阿与西塞罗，专心于希腊模式，她的法学家曾接受芝诺和克律西皮斯的严格训练。

以公元前 2 世纪为界 那时基督教的影响隐约可见 如果我们根据其实际的立法来作出对古代政治的判断 那么我们的评价就低了。流行的自由概念是不完善的，努力实现之其标准就很宽泛。古代人对权力规则的理解好于对自由规则的理解。他们把那么多的特权集中于国家以致一个人不可能否定其立法或限制其活动。如果我可以用一个不合时宜的表述，古代的国家体制乃是政教合一。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无别；宗教、道德和政治中仅只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权威。该国家对教育，对实用科学，对贫穷和无助者或人的精神需要漠不关心，然而却声称发挥了它的全部能力和规定了它的全部责任。个人与家庭，交往与依赖是那样专注于实利，以至于统治者的权力只用于自己的目的。奴隶在其主人手中的情况如何，公民在共同体手中的情况就如何。最神圣的义务也在公众优势面前消失。旅客的存在只是为了船。由于它们忽视个人的利益和人民的精神福祉与发展，希腊和罗马都损害了国家繁荣赖以为基础的关键要素，

家庭的衰落和国家人口的减少毁了它。他们幸存下来的不是他们的制度而是他们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特别是统治的艺术，他们——

人虽逝去 但权杖依存
从冥冥中统治着我们的精神。

的确，从他们那里几乎可以追溯到所有暗中破坏政治社会的错误——乌托邦主义、暴政与权力、无法无天与自由之间的混淆。

人原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只有暴力，没有法律，这样一种观点要归功于克里蒂厄斯。共产主义的最粗糙形式由西诺普的第欧根尼提出。按照这位智者的观点，没有高于利己的责任，没有离开快乐的德行。法律是弱者的一项发明，旨在剥夺优秀者对其优势的合理运用。处罚错误比受错误折磨更好；没有什么好事能比作恶而用不着担心受惩罚更大，所以也没有什么恶比遭受痛苦而复仇无望更糟。正义是胆小鬼的面具；不义是世俗的智慧；责任、顺从和自我否定是欺世者的伪善。政府是专制的，可以随心所欲任性而行，臣民不能抱怨它错待了自己，但是只要他能够逃掉强迫和惩罚他总是愿意不服从。幸福在于得到权力和逃脱必要的服从；即使靠不忠和谋杀得到王位，他仍值得受人羡慕。

伊壁鸠鲁只在很少方面不同于这位革命专制主义道德标准的阐述者。他说，所有社会都建立在互相保护的契约基础之上。善与恶不过是方便用语，因为正义与不义的降临犹如晴天霹雳。该反对的不是犯罪过程，而是犯罪者所造成的后果。聪明人设计法律，不是为了束缚自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当它们被证明无用时就会被停止生效。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也表现出偏狭

之处，如亚里斯多德说，坏政府的标志是让人们随心所欲自由地生活。

如果你记得最出色的异教徒苏格拉底所知道的人的标准以及行为举止也不比各国的法律更高更好；柏拉图，他的精彩学说是那样接近基督教的期望，以致有著名神学家希望他的著作能得到禁止，以免人们赞同他的观点，而漠视更高的教义——他被承认为是对那位被谴责、遭打击、受惩罚和死于十字架的义人幻像的先知——然而却利用赋予人类的最聪明的才智提出废除家庭和弃婴；亚里斯多德，古代最有才华的伦理学家，看不到劫掠邻边人民使他们沦为奴隶所造成的伤害——而且 如果你想，在现代人中天才人物的政治学说中罪恶与谬误也不少——那么你就会很明白多么顽固的一堆错误在阻碍着真理的道路：纯粹理性在解决自由政府问题方面像习惯法一样软弱无力；它只能是长期、多方面和痛苦的经验之果实；探寻用神的智慧教育人民珍视和承担自由之责任的方法乃真正哲学的重要内容，该哲学研究旨在

坚称上帝永恒
并证明人近神的道路为义

但是考察他们犯怎样的错误，如果我揭示的仅是他们思想未必强过行动，那么我给你关于古人智慧的概念就不完全。政治家、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提供了各种各样错误之事例，贵族文学也就在这时诞生，其中保存了政治知识的无价之宝，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展示了当时制度的缺陷。古代人意见最接近一致的是人民的统治权利，但他们又没有能力独自统治。为解决这个难题，为让大众实现对权力的充分分享而不是垄断，他们一般都采用